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杨国楨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1926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20世纪20年代复兴国学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实际运作中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却是源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是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关键词: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学科建设; 国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06)05-0005-09

1926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复兴国学的一次重要的实践。但它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还是近年来的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一定意义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是厦门大学的学科建设,而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回溯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学对于当今自主创新的文化建设的意义。

厦门大学为什么要设立国学研究院?这要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说起。

光绪十六年(1890),17岁的陈嘉庚出洋到新加坡经商。他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1912年秋回国创办集美学校,1919年6月回国筹办厦门大学,都是“为爱国愚诚所迫”。他认为:“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1]“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2]“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专门知识,不足躡等以达。”^[3]1918年6月18日,他又在新加坡《国民日报》上说:“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

收稿日期:2006-06-06

作者简介:杨国楨(1940-),男,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乎。”明确地把兴学与“保我国粹，扬我精神”联系在一起。

兴学，就是办新式学校，推广科学教育。陈嘉庚指出：“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源，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4]但科学之教育，并非全盘移植西方学科，抛弃中国传统学术。1918年，新加坡美国教会拟筹办星洲大学，请陈嘉庚首捐十万元（叻币，下同）以为华侨倡导，他当即应承，“但声明以该大学须兼教中文科，所捐十万元作该科基金为条件”。^[5]（P19）可见他对大学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视。1921年6月，陈嘉庚选择林文庆为厦门大学校长，认为南洋数百万华侨中，能通西洋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精神者，当首推林文庆博士。而林出任厦大校长时，曾向陈嘉庚询问办学的宗旨，究竟注重国学，抑或专重西文？他的回答是：“两者不可偏废，而尤以整顿国学为最重要。”^[6]这些均使厦门大学在创办之初，便与振兴中国人文学学术结下不解之缘。

陈嘉庚对厦门大学的未来充满信心。1923年4月3日，陈嘉庚写信告诉友人说：“余料不出二三十年……我厦大生额万众、基金万万。”^[7]陈嘉庚经营的产业，以树胶（橡胶）园、树胶厂、制造厂为大宗。5月，他宣布将在新加坡的四千英亩树胶园及陈嘉庚公司股本1/3余，拨充为厦大基金。1924年，英国在海峡殖民地实施“斯蒂文逊计划”（Stevenson scheme），限制树胶出产，抬高了树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1925年，胶价由每担30余元，逐月上升，至冬间竟达200元。这就使陈嘉庚企业利润大增。他后来追忆说：“当四十六岁（1919年）倡办厦大时，已存有资产四百万元，至五十二岁增至一千二百万元。”“由五十岁至五十二岁三年（1923年—1925年），为一生中登峰造极，得利最多及资产最巨之时。”^[8]（P420-414）他决定加大对集美、厦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两校设备及经常费，“年开八九十万元，自度决无过限”。^[8]（P420）1925年，他规划今后四年，厦大每年招生二百名，预计设备、建筑和常年费共须五百万元，“若胶价果能如弟所按者，则供给额数或可再增多少”。^[9]这就使厦门大学获得加速发展的独特机遇，“其经费之充裕，设备之完全，不仅为南方各大学所不及，即全国公私立大学能与之匹敌者，亦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6]在陈嘉庚的热心资助下，厦门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便提到日程上来。

二

厦门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开学，设师范部和商部（预科）。文科、理科隶属于师范部，属于师范性质。林文庆主长厦大后，于11月进行教育体制调整，将原有的师范部扩充，独立设置教育学部、文学部、理学部。1922年7月，增设工学部、新闻学部。1923年4月，改学部为科，计分教育科、文科、理科、工科、新闻科、商科，下设学系，向综合性大学转型。1924年6月，将工科并入理科，下有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植物学系、动物学系、工程学系等6个系；教育科、商科、新闻科并入文科，下有国文系、外国语言文学系、政治学系、哲学系、历史社会学系、教育学系、商学系、新闻学系等8个系。1925年夏秋，增设法律学系，商学系经济学门扩建为经济学系。这时的文科，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大学科，新兴人文社会学科受到重视，体现追赶世界学术潮流的求新意识。

林文庆，祖籍福建海澄，生于新加坡，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香港大学荣誉法学博士。他接受西方教育，精通英、马来、泰米尔、日等多种语言文字，在厦大学科建设上仿效西方模式，并引进一批留学博士来校任教。但他不因出身医科而轻视文科，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感情深厚。早在大学时代，就因自己中文汉语水准低而深以为耻，后从岳父黄乃裳苦学中国古代经典，逐渐掌握古今汉语，并熟谙闽、粤方言。他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体会儒家学说的价值，是清末民初东南亚推广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他参与创办了“华人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和英文

《海峡华人杂志》(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担任中文《天南新报》顾问,用中英两种文字撰文阐述孔子学说,主张年轻一代的华侨应该正规地接受孔子的伦理价值观,积极参加南洋华侨社会的“孔教复兴运动”,认为“把一个民族的一切传统凭空割除,而仍然希望它能够兴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被切断历史和传统的民族,就好比一棵被砍断的树,势将枯萎和衰落”。[10](P31)他支持过康梁维新变法,后加入同盟会,支持孙中山革命。民国成立,孙中山任命他为南京临时政府卫生部长。1912年秋,与陈嘉庚同船回国,到北京出席医学会议。“在会议席上,一般人对于医学名辞,多用洋文,将中国固有名词,完全废弃,不禁生无限感慨。因念中国数千年来固有文字,竟衰替一至于此,真足令人痛心切齿。”所以,1921年担任厦大校长之后,“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6]1923年即重金礼聘精通经史子集、小学目录、山经地志乃至财政经济之学的陈衍^①为文科国文系主任。1924年,林文庆又在厦门大学校庆三周年演说时,进一步表明态度:“当陈校董在南洋聘予回任校长时,予询以办学宗旨,陈校董答以当注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予是以欣然归国,予亦尊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也。”[11](P230)

由于林文庆对国学的提倡,厦门大学面对国内复兴国学的学术潮流有所回应。1925年,厦门大学教员学生发起与海内闻人组织“国学专刊社”,举陈衍为主任,其高足叶长青为社长。该社“以整理国故、发扬文化为己任”,在教员学生中引起共鸣,先后入社者达50余人。虽然陈衍于10月告假,继而辞职,叶长青改就金陵大学,“国学专刊社”陷于停顿,但这一行动本身还是在厦门大学内产生了影响,被视为“国学专刊出世之先声”。[12]

林文庆虽然尊孔,但他没有把国学等同于儒学,反而认为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的文化,其内容涉及所有的学科门类。林文庆策划组建的国学研究院,不是以国文系为依托,而是比文、理、法、工、商科地位更高,与大学部、高等学术研究院平行的机构,体现研究型综合大学的特点。

1925年12月,林文庆动用全校教育资源,成立国学研究院筹备总委员会,亲任主席,文、理科主任及著名教授、外籍学者出任委员,讨论、制订了国学研究院章程。与其他大学建立的国学研究机构不同,它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大纲》表述“国学”的概念,是“中国固有文化”,研究之目标包括:“(一)从实际上采集中国历史或有史以前之器物,或图绘影榻之本,及自然科学之种种实物,为整理之资料;(二)从书本上搜求古今书籍,或国外佚书秘籍,及金石、骨甲、木简文字,为考证之资料,并将所得正确之成绩,或新发见之事实,介绍于国内外学者。”为此,在组织上暂设14组,即历史古物组、博物组(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组(礼俗、方言等)、医药组、天算组、地学组(地文、地质)、美术组(建筑、雕刻、磁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纺织、书法)、哲学组、文学组、经济组、法政组、教育组、神教组、闽南文化研究组。[13]这个思路,已超越国学即“整理国故”的范畴,把中国自然和人文的材料,中国固有的学问,用分科研究的方法来整理。全校大多数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都参与筹办,理科如动物学系主任秉志、植物学系主任钟心煊等,还实际分担研究领域,草创厦门大学植物标本馆,筹办动物标本馆,收集大量中国主要品种之木材标本、海岛生物区系海洋生物标本。

在国学与分科研究的结合上,林文庆的设计恐怕在当日新潮学人中是走得最远的。这表明他对国学的理解有其过人之处。

^① 陈衍(1856—1937),号石遗,福建侯官人,晚清举人,以精深的诗学、儒学、经学、史学造诣在清末民初文坛上享有盛誉。1916年,应福建省长许世英聘,总纂《福建通志》,1923年受聘厦门大学文科教授。1925年辞去厦大教职。1931年,应唐文治敦请,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席,次年,与章太炎等在苏州筹建国学会,并主编《国学论衡》。

1926年,陈嘉庚为厦大集美支去经费九十余万元,为历年之最。6月,他写信给林文庆校长,表示拟增拨经费,扩充厦大,请多聘国内外名宿任教,并加意教学革新,使之成为国内第一流大学。厦门大学又一次进行科系调整,分科教育进一步细化。工程学系从理科划出,恢复工科,筹备医科和矿科;教育学系从文科分出,恢复教育科,下分教育学系、教育心理学系、教育行政学系;商学系从文科分出,恢复商科,下未设系,分商业学、会计学、银行学三门。法律学系从文科分出,增设法科,原隶文科之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并入之。

调整后的文科,新闻学系停办,剩下国文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哲学系、历史社会学系4个系。林文庆敦聘林语堂为文科主任、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语言学正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招揽北京著名学者加入厦大文科和国学研究院。〔14〕经林语堂广为联络,引进沈兼士、周树人(鲁迅)、罗常培等至厦大文科国文系,张星烺、顾颉刚、陈万里、容肇祖、黄坚、孙伏园、章廷谦、潘家洵、丁山入国学研究院,并由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主持,对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章程重新修订。

实际运作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放弃林文庆筹办时期的设想,采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组织大纲》称:“本院以整理国故并养成国学之专门人才为宗旨”,“凡本大学学生及本大学承认之各大学学生或有研究国学之志愿者,经本院考验合格,得为本院研究生。”研究院院长由校长兼任,主任计划及办理本院一切关于学术之事项,总秘书管理本院一切行政事项。主任、总秘书办公室各设襄理一人。必要时得聘名誉顾问及通信顾问。下分研究、陈列、图书、编辑、造形、出版六部。〔15〕据《本大学国学研究院系统表》,研究部分语言文字学组、史学及考古学组、哲学组、文学组、美术音乐组,职员分研究教授、导师、助教、学侣、书记;陈列部分古物组、风俗物品组、研究成绩组,职员分干事、事务员、书记;图书部分访购组、目录组、典藏组,职员分干事、编辑、事务员、书记;编辑部分丛书组、报告组、定期刊物组、翻译组,职员分干事、编辑、书记;造形部分摄影组、图画组、模型组、摹拓组,职员分干事、事务员、书记;出版部分印刷组、发行组,职员分干事、事务员、书记。〔16〕与筹备总委员会拟定的《组织大纲》相比较,研究范围大为压缩,取消原由理科、教育科、商科、法科承担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与调整后的文科相对应。

国学研究院院长由校长林文庆兼任,院主任由国文系主任、文字学正教授沈兼士兼任,院总秘书由文科主任、外国语言文学系英语语言学正教授林语堂兼任。国学研究院行政和学术负责人依托于文科,国学研究院职员则与文科各系教员互有兼职:

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张星烺,兼文科历史社会学系历史门教授,讲授《中外文化交通史》、《中外地理沿革》。国学研究院史学研究教授顾颉刚,兼文科国文系名誉讲师,为三年级学生讲授《经学专书研究》。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俄国人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gorov),兼文科历史社会学系教授,讲授《人类学》。国学研究院考古学导师、造型部干事陈万里(兼管考古学事宜),兼文科国文系名誉讲师,为二年级学生讲授《曲选及曲史》。国学研究院哲学助教、编辑容肇祖,兼文科国文系讲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目录学》,为三年级学生讲授《诸子专家研究》。国学研究院英文编辑(兼管一切英文函件)潘家洵,兼文科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讲授《英汉对译》、《英文戏剧》。国学研究院陈列部干事(兼管造形部摄影事项)黄坚,兼文科主任办公室事务员。国学研究院出版部干事章廷谦,兼校图书馆编辑。

文科国文系教授周树人(鲁迅),兼国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教授;文科历史社会学系社会学门教授林幽,文科哲学系兼外国语言文学系德文学门副教授、德国人艾铿风(G. Ecke),也在国学研究院兼职(职务不详,现存文献佚载)。校图书馆中文部干事陈乃乾,兼国学研究院图书部干事(未到任)。

国学研究院的专职人员,书记(文书)以上都是编辑人员;编辑部干事孙伏园(兼管风俗调查事宜),编辑丁山,编辑林景良(兼管报告及定期刊物),编辑王肇鼎(兼陈列部事务员)。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职能,一是整理国故,二是养成国学之专门人才。

在整理国故方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于9月18日召开编辑事务谈话会,议定出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简称“厦大国学”,英文名字为“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Sinology, Amoy University”,定于12月创刊,分别于12、3、6、9月各出一期;编辑部共同编辑《中国图书志》,将中国所有各种图书目录汇编成帙,以为将来研究国学之门径,先由主任沈兼士编辑书目之书目。[17]旋由编辑部制订编辑旨趣、凡例及格式,每书一种填表一张,大体就绪再重新分类。10月间由院内同人认定部类,担任编纂。[18]院内各员的分工是:谱录类书目,沈兼士(沈告假后由容肇祖续编);尚书,顾颉刚;春秋,顾颉刚;小学,丁山;地理,张星烺;医学,陈万里;曲,陈万里;小说,周树人;道家、儒家,容肇祖;金石,容肇祖;政书,王肇鼎;法家,王肇鼎;集,林景良。[19]12月13日,国学研究院开全体教职员临时会议,决定出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由顾颉刚、容肇祖任编辑主任,每星期三出版,明年1月5日发刊第一期。[20]

在养成国学之专门人才方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于9月25日公布《国学研究院研究生研究规则》,规定:本大学及本大学承认之大学本科毕业生或对于国学方面具有特殊之学力及成绩者,可报名申请,经学术会议审查(必要时得用口语)合格,得领研究证入院研究;本院教员可以提出题目,招集有相当学力之研究生入院指导或共同研究;凡本校毕业生及校外学者有研究之志愿而不能到校者,得为通信研究生。[21]10月18日,国学研究院研究部开第一次学术会议,审查研究生之入学资格,通过合格者2人。[22]到11月30日报名截止,共有约50人报名。1927年1月,再开学术会议,审查合格之研究生14人。[23]吸收院外学生参加研究项目,也是养成国学专门人才的方法之一。如编辑《中国图书志》,考虑到“此种编纂,不啻为目录学上之一种良好训练,于中国书籍之源流及版本上给予实习之机会”,允许本校学生自由报名参加。[18]又如新年风俗调查,考虑到“本校教职员同学中多有本地及各省人士,关于新年风俗,各地有其特色,一旦汇集一处,必成蔚然大观”,向全校师生征稿。[24]

在院内外讲演,宣传治学成果和治学方法,也是国学研究院职员的任务。据不完全的资料,全校性的讲演有:沈兼士的《对于教育上之感想》(9月30日),林文庆的《孔子学说是否适用于今日》(10月3日),顾颉刚的《孔子何以成为圣人》(10月3日)^①、张星烺的《爱国要素必先求学问》(10月10日),周树人的《好事之徒》(10月14日),潘家洵的《如何为大学生》(12月16日)等。院办学术讲演有:张星烺的《中世纪之泉州》(11月13日),林语堂的《闽粤方言之来源》(12月18日)等。

四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继承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传统,提倡用科学方法对国学进行研究。在成立大会上,研究院主任沈兼士指出:“从前研究古学,态度不外两种,一则信人,一则信己。所谓信人,即凭各种传说,而持为考证。所谓信己,则又凭有限之常识而已。此种研究,在此科学昌明时代,殊无价值可言……故现时欲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始有真确之可言。”“欲研究古学,非从书籍纪载之外,一方再以实物引证不为功。故本院因此二者之重要,特设图书部与陈列部,以资参考,期得完全明确之证据。”院总秘书林语堂指出:“欧西各国学

^① 后发表于《厦大周刊》的题目为《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见该刊第160期,1926年10月23日。

者,对于各种科学之成功,虽至微之处,不敢稍事忽略……吾人研究考古学,亦必抱此精神。”张星烺也说:“从前中国各种学说,类多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不如西洋学说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凡中国一事一物,欲求明确真正之标准,殊不易易。”[19]从国学研究院同人的研究工作,可以看出进行的方式是分科研究。“材料是中国的,但方法却是世界的。”[25]

10月18日,国学研究院研究部第一次学术会议决定教员自行研究题目有:沈兼士的《扬雄方言之研究》,张星烺的《马哥孛罗游记》(继续)、《中西交通史》(继续)、《闽省氏族迁移史》,周树人的《古小说钩沉》(整理)、顾颉刚的《汉以前的知识界与宗教界》、《中国南部民族的宗教信仰》,容肇祖的《魏晋思想史》,陈万里的《中国之石窟造像》、《倭寇侵扰中国史(倭寇与福建)》。[22]后又增加史禄国的《福建人种考》、《福建孩童长成测验》、《东胡语言比较字典》。[26]

11月,决定出版《国学研究丛书》共10种,即:林语堂、顾颉刚的《七种疑年录统编》,张星烺的《马哥孛罗游记》,周树人的《古小说钩沉》,林语堂的《汉代方音考》,丁山的《说文阙字考》,张星烺的《古代中西交通征信录》、《中外交通史料丛书》,周树人的《六朝唐代造像汇编》,陈万里的《云岗石窟写真集》,江绍原的《中国古代风俗考》。[27]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原定1926年12月出版,《厦门大学周刊》载有该期目录:《发刊词》,沈兼士:《今后研究文字学之新趋势》,张星烺:《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林语堂:《西汉方音区域考》,顾颉刚:《孔子何以成为圣人和何不成神人》,鲁迅:《嵇康集考》,陈万里:《云岗石窟小记》,丁山:《释单》,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史禄国:《中国人种概论》,张星烺:《泉州访古记》,王肇鼎:《西汉货币问题之研究》,潘家洵译:《形声字之研究》(珂罗掘伦著),林语堂译:《论古韵》(珂罗掘伦著),林景良:《本院成立会记事》,史禄国:《书评》。①

研究部的任务还有指导学生研究,拟指导经学术会议审查合格之研究生的研究题目有:郑江涛:《诗经描写下的社会现象》,高兴 蓂:《太姥山》,陈佩真:《诗学研究》,黄觉民:《古代井田的研究》,魏应麒:《王审知开闽史》,伍远资:《明季的海外孤臣》,孙家璧:《论语中的孔子及其和诸子的关系》,陈家瑞:《中文小说编目、漳州古迹》,汪剑余:《牡丹亭传奇考》,蒋锡昌:《老子校释》,黄天爵:《经济观之中国南方交通史》,陈祖宾:《中国语言文字略、莆田方音及闽南各县方言》,蒋连城:《许书通谊》,戚其芊:《朱子哲学》。[23]

这些研究计划,使厦门大学处于国学研究的前沿。如能实现,势必加快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所产生的国内一流、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的研究成果,诚如顾颉刚致胡适书中所言:“张亮丞先生的《马哥孛罗游记》及《古代中西交通征信录》是近年的两部大著作,如果由厦门大学出版,便可提高厦大的地位。”[28](P424)

正式开办的国学研究院,设置在生物院大楼。该院的宗旨虽已与国学研究主流派趋同,人事上以南下的北京大学学人为主,但地址的选择仍沿袭林文庆自然与人文并重的思路,特别是国学研究院的陈列部展室,可以与植物标本馆、动物标本馆结合在一起。陈列部刚组建,即以本院职员的私藏为主布展,并在成立大会后对外开放。“陈列室有二,东则陈列周树人教授所藏拓片,大多数为六朝隋唐造像。又陈万里先生所藏大同云岗拓片、敦煌像片等。西则陈列各种古物,大都为河南洛阳一带所出土者,约百数十件。余则有本校商科所藏古钱。”[6]12月18日,举办厦门交涉使刘光谦先生所藏古书画展览。[29]同时,收受外间捐赠并自购风俗物品,设风俗物品陈列室,作为风俗博物馆之初步。[24]顾颉刚后来指出:“我们去的半年中,厦门、泉州、福州等处搜罗的风俗物品也有数百件。”[30](P2)

① 见《国学季刊将付印》,《厦大周刊》第164期,1926年11月20日。按:珂罗掘伦(Bernhard Karlgren),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对考古实物和社会调查的重视,不仅是北大学人原有计划的延伸,而且是筹备总委员会的共识。两者的结合,使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特色更加显著。在成立大会上,林文庆强调“此次特组织国学研究院,聘请国内名人从事研究,保存国故,罔使或坠;一方则调查民间风俗言语习惯等。因我国各省言语不同,如就南方而论,闽有闽语,粤有粤语,甚至县与县殊,乡与乡异,民间动作因之隔阂甚多,苟不统一使之一致,将来必致四分五裂,其危险有不可言喻者矣。”沈兼士赞同院长的主张,说明“本院于研究考古学之外,并组织风俗调查会,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与考古学同时并进。”[6]顾颉刚也明确指出:“我们知道如果不能了解现代的社会,那么所讲的古代社会便完全是梦呓。所以我们要掘地看古人的生活,要旅行看现代一般人的生活。”[25]

在考古方面,成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考古学会”,决定参加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发起组织的“东方考古学协会”,组织发掘团。考古发掘预定计划之发掘地点,有河南安阳县小屯殷墟(曾发现龟甲兽骨)、河南洛阳城外朱家疙答魏太学遗址(曾发现石经)、甘肃镇番县(曾发现新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过渡期间之陶器)、甘肃敦煌玉门古长城遗址(曾发现木简等),拟先从安阳下手,成功后再扩充范围,“网罗地质学、文字学、历史学、人类学、美术史等专家,组织大规模的团体,为远地发掘事业之计划,苟能如此进行不懈,将来继长增高,我国之考古学庶几可于世界学术界中占一位置焉”。[31]研究部职员相继对泉州进行文物的田野调查。张星烺、陈万里与艾锷风于1926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即对泉州古迹及关于中外交通史料进行调查,回校后详细向林文庆报告调查细节。[32]1926年12月15日至24日,顾颉刚、陈万里与王肇鼎又到泉州访古调查,顾颉刚主要调查神祀,王肇鼎主要调查风俗传说,陈万里则负责调查古迹。1927年1月16日至19日,陈万里与厦门大学教育科主任孙贵定教授等第三次到泉州考察。后来陈万里在《泉州第一次游记》中说:“(张星烺)是为其所专门研究的学问搜寻材料。锷风之游泉州,此实第三次,他所依恋不能忘情的是开元寺的古塔。在我,希望一往灵山,探索回教徒的古墓。”艾锷风在1925年就开始考察泉州开元寺东西塔,收集佛教雕刻和肖像。国学研究院筹备委员、瑞士人戴密微(P. Demieville)则对东西塔故事和肖像进行研究。10年后艾锷风和戴密微将在厦门大学期间对泉州开元寺古塔的研究成果,合著《刺桐双塔: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 A Study of Later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社会调查方面,由顾颉刚、林幽、容肇祖、孙伏园发起,成立“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风俗调查会”,吸收本校教职员、学生乃至校外人士为会员,调查工作先从闽南入手,次及福建全省,再次及于全国。当时的民俗学,“还是在搜集材料的时代,不是在研究的时代”,顾颉刚认为民俗材料和甲骨文字“在文字学和史学上开出一个新天地”一样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应当认定自己的工作,向某一个小范围内去努力搜集材料”。[30](P2-3)《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发出启事,广泛征集民俗资料,主要征集福建家谱,民族迁移及土地开拓的传说、史迹,海神、土地神及洛阳桥等的传说;朱子、郑成功、郑和及倭寇的传说、遗迹与记载;歌谣、谜语、绕口令、歇后语;儿童故事及游戏;福建省富有地方性的戏剧及其剧本;苗民(或散居各地之盘、雷、蓝等姓)之生活状况;关于各地古迹、古物之调查记录等。[33][34]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共编成4期(其中第4期末印行即停刊),涉及风俗调查的文章有:林语堂的《平闽十八洞所载古迹》,顾颉刚的《泉州土地神》、《天后》,陈万里的《泉州第一次游记》,林幽的《风俗调查计划书》,高子化的《云霄的械斗》,潘家洵的《观世音》。列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选题未及发表的还有顾颉刚的《厦门的墓碑》,孙伏园的《记绍兴之堕户》、《儿童游戏的种类及家族经济》,容肇祖的《厦门的偶像崇拜》,丁山的《新风俗论》,潘家洵的《抱牌位做亲》,黄天爵的《海澄煨户》,王肇鼎的《石湖的五圣》,林惠柏的《闽南乡村生活》,林惠祥的《闽南的下等宗教》等。

校外人士参与风俗调查会活动,贡献最多的,是厦门同文中学文史教员谢云声。谢云声“搜集

福建歌谣的工作,从民国11年(1922)以后,时作时辍。……当15年(1926)十月,顾先生来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时,蒙他不弃,时常征我关于闽省的民众文学”[35](P10),促他再整旗鼓地从事搜辑。在顾颉刚离开厦门大学之后,他整理完成《台湾情歌》200首,《闽南歌谣》250首,寄给顾颉刚,在广州出版。

五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办之际,陈嘉庚企业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由于荷兰不受英国在海峡殖民地实施“斯蒂文逊计划”的约束,在印尼拼命增产,国际胶价连连暴跌,陈嘉庚企业的利润缩水。这就严重影响到扩充厦大的计划。他虽“一息尚存,此志不减”[36],但增拨经费部分已难兑现。厦大摊子铺得过大,各科在经费分配上难以协调,林文庆承诺给国学研究院的经费迟迟未能落实。“至冬,树胶价降如流水就下,由每担百七八十元而跌至九十余元,各厂不但乏利,尚当亏损。由是厦大校舍已下手建设者,使至完竣便止,而集美建设则于冬间完全停止。”[8]1927年,校方无奈宣布停办工科、医科、矿科和国学研究院。对于集美、厦大扩充的受挫,陈嘉庚痛心万分,说:“此为我一生最抱憾、最失意之事件。”[37]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实际运作半年,丧失引领国学研究潮流的机会,留下深深的遗憾,但它从筹办到开办的实践,在现代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与同时期的新国学各研究机构相比,为时不久的厦门大学国学院的学术成就固然赶不上北大和清华,却不逊色于齐鲁、燕京的国学研究所和东南大学国学院,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38]

时代进入21世纪,学术界反思人文学术的自主性和原创性危机,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国学,又一次成为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一个热点。85年的风风雨雨,厦门大学不屈不挠地走过来了,终于实现了陈嘉庚“生额万众、基金万万”的理想,相信也能继承陈嘉庚“整顿国学”的遗愿,重振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雄风,完成先辈未竟的事业。

参考文献:

- [1] 陈嘉庚.致集美学校诸生书[Z].1918.集美校委会藏.
- [2]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词[N].(新加坡)新国民日报,1920-11-30.
- [3] 陈嘉庚.筹办福建厦门大学校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Z],1919年7月.
- [4] 陈嘉庚.本报开幕宣言[N].(新加坡)南洋商报,1923-09-06.
- [5] 陈嘉庚.参加捐办星洲大学[A].南侨回忆录[M].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
- [6] 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N].厦大周刊:第159期,1926-10-16.
- [7] 陈嘉庚.致陈延庭书[Z].1923-04-03.集美校委会藏.
- [8]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A].南侨回忆录[M].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
- [9] 陈嘉庚.致叶渊书[Z].1925-07-26.集美校委会藏.
- [10] Khor Eng Hee.林文庆传[M].陈育崧,李业霖译.林文庆博士诞生百年纪念刊,1969.
- [11] 厦大校史资料:第1辑[Z].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 [12] 国学专刊出世之先声[N].厦大周刊:第137期,1926-01-23.
- [13] 厦门大学国学院组织大纲[N].厦大周刊:第134-135期,1926-01-2,9.
- [14] 新聘教职员略历[N].厦大周刊:第156期,1926-09-25.
- [15] 组织大纲[N].厦大周刊:第160期,1926-10-23.
- [16] 本大学国学研究院系统表[N].厦大周刊:第160期,1926-10-23.
- [17] 国学研究院谈话会纪略[N].厦大周刊:第156期,1926-09-25.

- [18] 国学研究院编辑中国图书志[N] . 厦大周刊: 第 162 期, 1926— 11— 06.
- [19] 中国图书志编辑现况[N] . 厦大周刊: 第 166 期, 1926— 12— 04.
- [20] 国学院发行周刊[N] . 厦大周刊: 第 168 期, 1926— 12— 18.
- [21] 国学研究院研究生研究规则[N] . 厦大周刊: 第 156 期, 1926— 09— 25.
- [22] 国学研究院第一次学术会议纪事[N] . 厦大周刊: 第 160 期, 1926— 10— 23.
- [23] 本院纪事[N] .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 第 1 卷第 3 期, 1927— 01— 19.
- [24] 国学研究院风俗调查会之发起与进行[N] . 厦大周刊: 第 169 期, 1926— 12— 25.
- [25] 顾颉刚. 缘起[N] .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 第 1 卷第 1 期, 1927— 01— 05.
- [26] 国学院最近之工作[N] . 厦大周刊: 第 164 期, 1926— 11— 02.
- [27] 国学院将出版书籍[N] . 厦大周刊: 第 165 期, 1926— 11— 27.
- [28]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册[Z] .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9] 国学院第二次学术讲演[N] . 厦大周刊: 第 168 期, 1926— 12— 18.
- [30] 顾颉刚. 闽歌甲集序[A] . 谢云声. 闽歌甲集[Z] .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 1999.
- [31]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发掘之计划书[N] . 厦大周刊: 第 158 期, 1926— 10— 09.
- [32] 张陈两先生调查泉州古迹及关于中外交通史料之报告[N] . 厦大周刊: 第 165 期, 1926— 11— 27.
- [33] 征求本省家谱启事[N] .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 第 1 卷第 2 期, 1927— 01— 12.
- [34]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社启事[N] .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 第 1 卷第 3 期, 1927— 01— 19.
- [35] 谢云声. 闽歌甲集自序[A] . 谢云声. 闽歌甲集[Z] .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所, 1999.
- [36] 陈嘉庚. 致叶渊书[Z] . 1926— 08— 18. 集美校委会藏.
- [37] 陈嘉庚. 畏惧失败才是可耻[J] . 东方杂志, 1934 31, (7).
- [38] 桑兵. 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J] . 近代史研究, 2000, (5).

[责任编辑: 陈双燕]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s of Xiamen University in the 1920s

YANG Guo-zhen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s of Xiamen University in 1926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in the early revival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The institute, modeled on the Chinese Classics Department of the Institute in Peking University, can be seen as the latter's continuation to some extent. However, the basic dynamic comes from Mr Tan Kah Kee's idea and it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design of the syllabus of the university. With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its position i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lassics can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s of Xiamen University, syllabus,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